

是基督徒的，還是猶太人的？

——考察《以賽亞書》敘利亞譯本的一個新視角

陳湛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珠海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助理教授

摘要

敘利亞文別西大（*Peshitta*）《舊約聖經》的影響沿着絲路遠澤華夏，是最早來華的聖經版本之一。學術界百年以來就其緣起雖爭論不休，但傾向將其歸於西元二世紀中期的敘利亞基督教群體。本文提出一個新的考察視角，並列舉了幾個前人未曾探討的案例，來表明敘利亞文《以賽亞書》的章句多次展現出對《新約》敘利亞文譯本的文本或者思維依賴；由此可知，別西大《舊約聖經》的《以賽亞書》譯本最終成書，或不早於別西大《新約》翻譯的最終成書時間。這一觀察將有助確定敘利亞文《以賽亞書》的譯者，很可能是熟稔敘利亞文《新約》的基督徒。同時，《以賽亞書》譯者對於經文的「新約化」改動，大多並非為了去猶太化的教義目的，而是無意為之。這為我們提供了聖經以及早期希臘教父的描述之外一個不一樣的、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相對和諧的相處圖景。

關鍵詞：別西大聖經 猶太教 《以賽亞書》 聖經翻譯
七十子譯本

別西大 (*Peshitta*) 版本的聖經是東方敘利亞教會所使用的權威聖經翻譯。別西大雖不是古典敘利亞文唯一版本——西元後十個世紀裏另有 Syro-Hexaplaric 版本, Philoxenian 版本, Harclean 版本, 以及艾德薩的雅各 (Jacob of Edessa) 修訂本¹——但影響力卻從未被與之競爭的其他敘利亞譯本超過。²尤其是, 隨着敘利亞基督教/景教東傳, 別西大版本也隨之東流。在中亞以及中國西部所出土的早期東方教會的敘利亞聖經殘片, 幾乎清一色是別西大譯文 (或略微改動的文字)。³

然而, 即使這一文本如此重要、傳播如此之廣, 別西大《舊約聖經》譯本的起源, 因為並無任何古代傳世文獻的可信說明, 比起其他幾個語言的重要古代譯本 (希臘文、阿拉米文以及拉丁文), 相對頗為模糊。最富爭論問題, 就是這一譯本舊約部分的翻譯, 原初的教派歸屬問題: 究竟是猶太人完成、並被基督徒所佔用 (如希臘文的七十子譯本), 還是, 本來就是由基督徒譯成。作者的教派政治身份, 本來很容易從行文思想風格的蛛絲馬跡中尋得。然而

-
1. 本文因涉及專有名詞頗多, 且多有未被介紹至中文世界的概念或專名, 徒為形式強譯中文未必雅觀、且不增添有效信息, 故從如下原則: 一、中文世界已有譯介、並有固定翻譯形式之概念專名以慣常中文譯名曾現, 並在第一次出現時標註英文慣常譯名或原文, 如殉教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二、中文世界並不熟悉之古代語言或非歐洲當代文字概念專名引用英文, 如 “Curetonian 與 Sinaitic 版本”, 不從拉丁文 “Codex Sinaiticus”。三、中文世界並不熟悉之當代歐洲文字概念專名各從其原文。
 2. Peter J. Williams,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1,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s. Joachim Schaper & James Carleton Pag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27-535.
 3. 參 Mark Dickens, “The Syriac Bible in Central Asia”, in *The Christian Heritage of Iraq* (ed. John Watt et al.;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09), pp. 92-120; Mark Dicke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salter at Turfa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eds.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Zürich, Berlin, Münster: LIT Verlag, 2013), pp. 357-380; Pier Giorgio Borbone, “Peshitta Psalm 34:6 from Syria to China”, in *Text, Translation, and Tradition: Studies on the Peshitta and Its Use in the Syriac Tradition* (eds. W. Th van Peursen & Bas ter Haar Romeny; Leiden: Brill, 2006), pp. 1-10。

苦於這是一本猶太經典的翻譯，譯者本人特異的身份及思想，總須受到原文極大制約和掩蓋。故學界數百年來，對於該問題一直爭論不休。近代以來，陣營基本分為兩派：自米夏埃理斯 (Johann David Michaelis)，基爾施 (Georg Wilhelm Kirsch) 至格澤紐斯 (Heinrich Friedrich Wilhelm Gesenius) 及內爾德克 (Theodor Nöldeke) 陣營以來之學者，支持基督教譯者；他們多從神學 (因翻譯中的基督教義特徵)、社會語言學 (因敘利亞文的濃厚基督教背景) 或者猶太研究 (因為猶太文獻中絕口不提敘利亞文聖經譯本) 的角度，支持其學說。⁴ 只是，這些意見抑或是旁敲側擊地由語言風格倒推教派 (此並非精確之舉)；或者，誠如布洛克 (Joshua Bloch) 所言，只是依賴部分基督教色彩頗濃的高光譯文 (如賽 7:14 關於「童女懷孕生子」段落) ——而這些基督教色彩頗濃的譯文，很可能並非來自譯本本身。畢竟，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教徒，都對這些段落十分敏感；⁵ 因此，很難排除這些特色段落被後世任何人篡改的可能性。⁶

而另外一方，自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猶太學者如佩萊斯 (Perets Perles)、蓋格爾 (Abraham Geiger) 以來的另一陣營則儘量在猶太的解經傳統視角之下觀察敘利亞文翻譯。⁷

4. Joshua Bloch, "The Authorship of the Peshitta",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35.4 (1919), pp. 215-222.

5. 殉教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便在他的《與猶太人特萊夫對話錄》(*Dialogus cum Tryphone Judaeo*) 記錄了針對這節經文的一段交火。猶太人特萊夫提出，希伯來文的經文寫的是「有少女懷孕生子」，並非如希臘文譯本的「有處女懷孕生子」，並且特萊夫依照猶太傳統，認為這一節經文指向同時代的猶太國王希西家，而非後世的耶穌基督 (Ixxvii)。基督徒游斯丁不覺得這是翻譯史上的一個失誤，反而反唇相譏，說猶太人才是修改聖經的好手 (Ixxi-Ixxiii)。游斯丁言下之意是：希臘文譯本的「有處女懷孕生子」才是經典原文；而猶太人特萊夫所提及的希伯來文「有少女懷孕生子」，可能反而是猶太人篡改經文的結果。

6. Ludwig Warszawski, "Die Peschitta zu Isaia (Cap. 1-39), Ihr Verhältnis zum massoretischen Texte, zur Septuaginta und zum Targum" (Ph.D. dissertation, Grossherzog. Landes-Universität zu Giessen, 1897), p. 10.

7. Perets Perles, *Meletemata Peschitthoniana* (Breslau: Friedrich, 1859)；Abraham Geiger, "Jüdische Begriffe und Worte innerhalb der syrischen Literatur", *ZDMG* 21.3 (1867), pp. 487-

如蓋格爾的經典論斷所言，「（別西大舊約譯本）不僅僅是一本猶太書籍的翻譯，而是完全依照彼時猶太教觀念所作」。⁸換言之，敘利亞譯文中似乎帶有同時代的、猶太世界觀的元素。因此，這一翻譯應當是猶太教徒所為。尤其是，在多卷舊約書籍、尤其是摩西五經中展現出許多敘利亞文譯本與某阿拉米文譯本有別於希伯來文本的相似翻譯或者處理方式：例如在《創世記》二十四章 40 節中，希伯來原文作「我行走在他（神）之前」（התהלכתי לפניו），而敘利亞文與阿拉米文譯本均作「我侍奉他」。類似相似於阿拉米文的譯文，將敘利亞文別西大譯本與猶太傳統的距離大大拉近。

然而，具體到我們要處理的《以賽亞書》，根據筆者的比照，不但幾乎完全沒有展現對現存的阿拉米文譯本的特定依賴；相反地，對於希臘文七十子譯本（LXX）的文本依賴卻頗深。眾所周知，雖然七十子譯本是猶太教徒所譯，但在西元二世紀結束以前，因為其多為基督徒所用，故導致猶太教逐漸放棄這一譯本。⁹更因希臘文在西元後二世紀仍是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之一，若是基督徒從相對陌生的《舊約》希伯來文翻譯聖經，多有可能借鑑七十子譯本，而若是猶太教徒則不然（如上文，會傾向借鑑阿拉米文譯本多一些）。¹⁰

因為篇幅所限，本文在正式論證開始之前，僅簡短評論這一對希臘文譯本的依賴現象：具體到《以賽亞書》的範

492；另參 Carl Heinrich Cornill, *Das Buch des Propheten Ezechiel* (Leipzig: JChinrichs, 1886), pp. 154-155；Sigmund Fränkel, *Die syrische Uebersetzung zu den Büchern der Chronik* (Leipzig, 1879)。

8. Geiger, "Jüdische Begriffe und Worte innerhalb der syrischen Literatur", p. 487.

9. Ernst Würthwein,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ia Hebraica* (2nd ed.;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 54.

10. 參 Michael Weitzman,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4ff。

圍之內，希臘文七十子譯本所展現出的影響雖明顯，但卻分佈十分不均。筆者將希伯來文本、希臘文本和敘利亞文本的全本《以賽亞書》進行了逐字對比，將其中所有敘利亞文譯本有別於希伯來文《以賽亞書》、且展現出對七十子譯本的相似之處，做出如下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不同章節對於七十子譯本的依賴強度，起伏變化極大。

章目	1-5	6-10	11-20	21-29	30-33	34-39	40-49	50-59	60-66
節數	115	115	151	182	86	117	242	159	124
依賴 LXX 節數	21	8	5	6	10	0	14	11	5
密度	183	70	33	33	116	0	58	69	40

其中，密度=(依賴 LXX 節數／節數)*1,000

這種變化，很可能是譯者的風格調整或者譯者不同所致；例如，可能某些部分是猶太教徒、有些部分是基督教徒所譯。這是一個極值得詳細探討的題目，但須另撰別文羅列闡述，在此只能提供這些暫時未發表的研究資料粗略說明。本文並不希望在這一傳統方法論（考察對七十子譯本或者阿拉米語譯本的依賴）下太多停留，而希望集中剩下篇幅，來展現一種新的、關於敘利亞文《以賽亞書》作者的基督徒身份的視角：即《舊約》譯者對於《新約》敘利亞文聖經的文本依賴。這種角度，之前學者幾乎未曾注意，或者頂多表示悲觀。¹¹但本文的幾個例子表明，敘利亞文《以賽亞書》譯者對於《新約聖經》的熟悉，或許是有助我們理解《舊約》敘利亞譯本來源的另一個重要線索。

11. Anthony Gelston, "Was the Peshitta of Isaiah of Christian Origin?", in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Scroll of Isaiah* (eds. Craig C. Broyles & Craig A. Evans; Leiden: Brill, 1997), pp. 568-569.

一、敘利亞文《以賽亞書》與敘利亞文《新約》諸譯本的關係

關於《新約》的敘利亞文譯本，情況比《舊約》敘利亞文別西大譯本複雜許多，所以也有必要簡單介紹。（一）首先，大約在西元一六〇年代，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學生、敘利亞人塔提安（Tatian the Syrian）著有《四福音調和》（*Diatessaron*），按照其自己的敘述方式，將聖經正典四福音內容雜糅在一卷書內。因為完整文本的軼失，人們只能從希臘文殘本，敘利亞作品引用、以及其他語言的對參翻譯，來恢復部分原本。這一重構極其困難，以致甚至關於《四福音調和》的原始書寫語言究竟是希臘語、還是敘利亞語，學界也爭論不休。¹²（二）在十九世紀，學者陸續從埃及的修道院中，發現兩份晚於《四福音調和》，但早於傳世的別西大敘利亞文新約翻譯的福音書譯本。這兩個譯本（*Curetonian* 與 *Sinaitic* 版本）被稱作「古敘利亞」版本福音書，因其較別西大版本古早緣故。這兩個版本如同四福音調和，並未囊括整本《新約聖經》，範圍只限定在四福音書範圍，目前已有學者將其整理出版。¹³（三）第三個與我們目前研究相關的版本，就是同樣名為「別西大」版本的新約聖經翻譯。該翻譯包含了大部分新約聖經（包括所有保羅書信），並在敘利亞東西支教派（東支「聶斯托利」派 [Nestorian] 與西支「雅各」派）分道揚鑣之前，就已成為了大敘利亞基督教世界共同使用的權威版本，並且歷經後世的其他版本（如 Harklean 版本）挑戰而屹立不倒，權威延續至今。其最終成書時間當在基督教第三次（431 年）與第

12. Jan Joosten, "Le Diatessaron syriaque", in *Le Nouveau Testament en syriaque* (ed. Jean-Claude Haelewyck; Paris: Geuthner, 2017), p. 55.

13. George Anton Kiraz, *Comparative Edition of the Syriac Gospels: Aligning the Sinaiticus, Curetonianus, Peshitta and Harklean Versions* (Leiden: Brill, 1996).

四次（451 年）大公會議這兩個主要處理基督人神二性問題的公會之前的五世紀初，然而其成書具體過程也十分未知。¹⁴

在探究《舊約》敘利亞文版本（別西大版本），與如上所述三個現存最早的《新約》敘利亞文譯本的依賴關係、尤其是引文間的相互差別時，傳統研究者往往習慣性地考察《新約》敘利亞版本對《舊約》敘利亞版本的文本依賴。其中隱約的前題邏輯十分清晰：既然希臘文原文《新約聖經》於《舊約聖經》之間的互文，是基於對《舊約聖經》（且不論是希臘文還是希伯來文版本的《舊約聖經》）的單向文本依賴；那麼，《新約》敘利亞文翻譯與《舊約》敘利亞文翻譯之間的相似性，也理所當然遵循着這條「新譯從舊」的因果方向，從而考察《新約》翻譯對《舊約》翻譯的依賴度。過去一個世紀偶爾出現的若干研究，並無心衝破這一框架。例如，學者約斯滕（Jan Joosten）在他的兩篇文章中，分別考察了別西大《舊約》翻譯與《四福音調和》之間的關係，發現了多處可能的相似之處。於是他斷定，敘利亞文四福音調和的作者，應當直接依賴已成文的《舊約》敘利亞文譯本。¹⁵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MT Ps 91:12 על־כפּים “on hands” = Matt 4:6 (= LXX Ps
90:12) ἐπὶ χειρῶν / C, S על דרעיהון (=OTP) “on their arms” /
NTP על אידיהון “on their hands”¹⁶

在此為不熟悉聖經學符號的讀者解釋一下這串標記：

-
14. Bruce M. Metzger, *The Early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ir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Limi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77), pp. 48f.
15. Jan Joosten, “The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in the Old Syriac and Peshitta Gospels”, *Textus* 15 (1990), pp. 55-76; Jan Joosten, “Tatian’s Diatessaron and the Old Testament Peshitta”,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0.3 (2001), pp. 501-523.
16. Joosten, “The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in the Old Syriac and Peshitta Gospels”, p. 60.

首先，MT Ps 91:12 על־כַּפַּיִם “on hands”，讀作：馬所拉（MT = Masoretic Text）希伯來文本的《詩篇》九十一篇 12 節的經文是，「在手中」。Matt 4:6 (= LXX Ps 90:12) ἐπὶ χειρῶν，讀作：新約希臘文的《馬太福音》四章 6 節，引用的是希臘文七十子譯本（LXX）《詩篇》九十篇 12 節的希臘文字句，「在手裏」。這裏，因為希臘文七十子譯本的《詩篇》與希伯來原文《詩篇》，在篇號上有所差別，所以希臘文《詩篇》九十篇正是對希伯來文《詩篇》九十一篇的翻譯。可以看見，在此處，《舊約》七十子譯本是對《舊約》原文的準確翻譯，《新約》原文引用此處七十子譯本也完全忠實。相對地，C, S על דרעיהן (=OTP) “on their arms”，讀作，「古敘利亞」版本福音書（C = Curetonian 與 S = Sinaitic 版本，不同於別西大《新約》譯本，見上文介紹）的翻譯是，「在他們的臂膀裏」：這完全與《舊約》敘利亞文譯本（OTP = Old Testament Peshitta）相同。最後，NTP על אידיהן “on their hands”，讀作：《新約》別西大版本（NTP = New Testament Peshitta）此處的翻譯是，「在他們的手裏」：這是一個介於 C = S = OTP 與《新約》、《舊約》原文之間的讀法。這個改正，改正了「臂膀裏」為「手裏」，卻忘記刪去多餘的人稱代詞「他們的」，所以最終得到一個折衷版本。

這意味着，對於約斯滕來說，「古敘利亞」版本福音書 C 與 S 的譯者在此處（太 4:6），既不是直譯《新約》福音書希臘文，也非查閱對應的《舊約》章節（詩 91:12）的希伯來文或其希臘文七十子譯本翻譯，而是借鑑了《詩篇》九十一篇 12 節的敘利亞文翻譯的相應章節並進行了引用。這一資訊至關重要：我們發現，C 與 S 的譯者對希臘文《新約》的翻譯，在此處並非完全忠實，而是受到其他平行文本的影響。譯者意識到了他正在處理一節《新約》對《詩篇》

的引用，因此回到了《舊約》的《詩篇》查閱被引文段的形態，並將後者，而非《新約》的希臘原文，忠實譯成敘利亞文《馬太福音》。再者，作者所查閱的對應《舊約》的《詩篇》，並非希伯來文或者希臘文的版本（「在手裏」），而是《舊約》的《詩篇》的敘利亞文譯本（「在他們的臂膀裏」）。對於約斯滕來說，雖有別西大《新約》的譯者，將《新約》C 與 S 的、與《新約》原文略有偏差的讀法，進行了帶回希伯來文《舊約》原文的改正嘗試（因為《新約》別西大版本介於 C 與 S 和《舊約》原文之間），但這一改正並不成功，而是殘留了 C 與 S 的要素。於是，約斯滕最終的結論很明確：《新約》敘利亞文翻譯者有這樣的做法，即在翻譯到《新約》對《舊約》的引用章節的時候，《新約》譯者似乎不滿足於直譯《新約》希臘文，而會翻查《舊約》某個版本的「原文」，以求原汁原味的引用。

然而，這滴水不漏的推論背後，隱藏着一個極重的方法論假設：即當任一《新約》敘利亞譯本與《舊約》敘利亞譯本同時背離於聖經原文，並恰好背離得完全平行之時，《新約》翻譯依賴於《舊約》翻譯。回到《馬太福音》四章 6 節引用《詩篇》九十一篇 12 節的例子：因為敘利亞文《舊約》翻譯，及《新約》的所有翻譯，皆偏離原文；當 S 與 C 的譯文與《舊約》敘利亞譯文相同時，則對於約斯滕，新約 S 與 C 依賴《舊約》敘利亞文。然而實際上，相反方向的依賴在理論上完全可能：為何不是，S 與 C 的《新約》翻譯在先，而《舊約》譯者在遇到《詩篇》相應章節之時，因為熟稔《新約》S 與 C 的文本，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將《新約》的（有瑕疵的）翻譯帶進了這節《舊約》經文的翻譯之中？這樣的可能性其實並不聳人聽聞。學者布羅克（Sebastian P. Brock）曾經提到過一個例子（別西大《以賽亞書》九章 1 節翻譯對

《新約》別西大《馬太福音》四章 16 節文本的靠近)，¹⁷就指出了《舊約》敘利亞文翻譯依賴《新約》翻譯的可能性。以「《新約》」校「《舊約》」的做法，似乎並沒有那麼離經叛道，邏輯上、實際操作上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可能性下，約斯滕需要排除這種「舊依賴新」的可能性，只需要加入一個更強的條件即可：即《舊約》敘利亞文在此處需要是對希伯來文的忠實翻譯，即 MT=OTP 即可。可惜，至少在這個例子上，該條件並不滿足。我們很難說明，敘利亞文的《新約》版本（C 與 S）與《舊約》敘利亞文（OTP）之間，在這一節經文上，究竟是誰依賴了誰。

二、敘利亞文《舊約》譯本依賴敘利亞文《新約》譯本的例子

在一篇新近發表的文章中，學者博多爾（Attila Bodor）具體考察了《以賽亞書》在《新約》福音書的敘利亞文各版本（C，S 與 NTP）中的所有引用章節，並斷定，只有《以賽亞書》四十章 3-5 節在《路加福音》三章 4-6 節（C，S 與 NTP）與《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2 節在《馬太福音》十二章 19 節（S 與 C）中的引用，精準展現出了對於《舊約》別西大敘利亞文版本（而非《新約》或者《舊約》其他版本）的依賴。¹⁸但是，考慮到《以賽亞書》在整本《新約》福音

17. Sebastian P. Brock, "Text History and Text Division in Peshitta Isaiah", in *The Peshitta - Its Early Text and History* (eds. P. B. Dirksen & M. J. Mulder; Leiden: Brill, 1988), p. 64.

18. Attila Bodor, "The Use of the Peshitta of Isaiah in Rendering Isaiah Quotations in the Old Syriac and Peshitta Gospels", *Aramaic Studies* 16.1 (2018), pp. 20-41. 需要注意的是，《新約》翻譯若發生了朝向《舊約》敘利亞文版本的偏差，並不直接等同於實際上依賴《舊約》別西大版本。方法論上，我們還需要一個條件，即《舊約》相應的敘利亞文翻譯也和原文間有所偏差，我們才能夠精準確定依賴關係。換句話說，當且僅當 A 與 B 的讀法相同並與其他所有版本都不同的時候，我們才能精準確定 A 與 B 依賴關係。如果，例如，《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2 節的敘利亞文翻譯是對希伯來文的忠實翻譯，我們就絕不可能斷定《新約》敘利亞文本依賴的是該經文的《舊約》敘利亞文本，還是希伯來文本。有鑑於敘利亞文《舊約》翻譯是一個對於希伯來文相當精確的翻譯，多數情況下甚

中被引用的次數之多，博多爾的結果顯然絕非理想。故其文最終結論是，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任何版本的《新約》敘利亞文譯者，在其翻譯《新約》所引用《舊約》章句之時，有系統翻閱並參照《舊約》別西大敘利亞文譯本的習慣。

顯然，博多爾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敘利亞文《新約聖經》依賴敘利亞文《舊約聖經》的框架之內。然而，他還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將是本文最重要的架構：如果，我們將把這個模型翻轉過來，即每當有敘利亞文《新約聖經》的引用章句，與敘利亞文《舊約聖經》中的被引用章句，展現出相似且不同於其他譯本之時，我們不僅考慮敘利亞文《新約》依賴敘利亞文《舊約》的可能性，也考慮敘利亞文《舊約》依賴於敘利亞文《新約》的可能性？當然，如果真的有後者情況發生，那麼，敘利亞文《舊約》翻譯最終形態的形成，很可能晚於《新約》敘利亞文，尤其是《新約》別西大版本的誕生：這不僅並非違背邏輯，倒是聖經初譯的歷史上，因《舊約》正典的篇幅之巨以及《新約》對於基督徒的需要之迫切等等實際原因，屢屢出現的情形：例如，中文世界的巴設神父（Jean Basset）即是從部分《新約》書籍着手翻譯；¹⁹更典型地，杰羅姆（Jerome）的武加大版本（Vulgate）的加工也大約沿着《新約》－《詩篇》－《舊約》其他書卷的順序進行。²⁰本節將選取四個工作中發現的典型例子來展現，別西大《以賽亞書》的翻譯過程中，譯者屢屢引入了敘利亞文《新約》版本的相關章句。

至是希伯來原文逐字對應的直譯，這樣小的文本距離，技術上，精準確定特異的依賴關係，確實十分困難。博多爾的否定結論只是在這種困難之下的、可以理解的實際不可能，而非理論上推翻福音書翻譯對於《以賽亞書》翻譯的依賴關係。

19. Zhao Xiaoya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arshman, Morrison, and Basset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6.2 (2012), pp. 6-34.
20. Pierre-Maurice Bogaert, "The Latin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s. Joachim Schaper & James Carleton Pag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14-515.

1. 《馬可福音》四章 12 節（徒 28:27）引用《以賽亞書》六章 10 節

希伯來文及七十子譯本《以賽亞書》（MT=LXX）六章 10 節

פְּנֵי־רְאֵהָ בְעֵינָיו וּבִאָזְנוֹ יִשְׁמַע וּלְבָבוֹ יִבִּין וְשָׁב וּרְפָא לּוֹ 「恐怕他的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 μήποτε ἴδωσιν τοῖς ὀφθαλμοῖς καὶ τοῖς ὠσίν ἀκούσωσιν καὶ τῇ καρδίᾳ συνῶσιν καὶ ἐπιστρέψωσιν καὶ ἰάσονται αὐτοῦς

敘利亞文《以賽亞書》（OTF）六章 10 節

דְּלֵא נַחֲזֵא בְעֵינֵיהּ וְנִשְׁמַע בְּאָדְנוּהּ וְנִסְתַּכַּל בְּלִבָּהּ וְנִתְּוֵב וְנִשְׁתַּבַּק לָהּ 「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原諒。」

《馬可福音》四章 12 節（P=C=S=NTG）

דְּלֵמָא נִתְּפָנּוּן וְנִשְׁתַּבַּקוּן לְהוּן חֲטֵיהוּן 「恐怕回轉過來，就得原諒」 = μήποτε ἐπιστρέψωσιν καὶ ἀφεθῆ ἑαυτοῖς

敘利亞文《以賽亞書》在此處對希伯來文本並非精準的翻譯（原文作「被醫治」，譯文作「被原諒」）。我們首先排除七十子譯本影響該動詞翻譯的可能性，因為 M=LXX；然後，對於阿拉米文譯本影響的排除，更加複雜一些。因為猶太的阿拉米文傳統確有將「疾病」翻譯為靈意化的「諒解」之慣例：這時，神對人身體的醫治，就可以被翻譯為對罪的原諒（《以賽亞書》阿拉米譯文中另有五十三章 4-5 節與五十七章 18-19 節含有相似意譯）。其原因或是神學的，²¹或

21. Jintae Kim, "Targum Isaiah 53 and the New Testament Concept of Atonement", *Journal of Greco-Roma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5 (2008), pp. 81-98.

僅僅是因為語言學因素：須注意，阿拉米文不同於希伯來文，將 III-א 與 III-ה 的單詞中字母“א”與“ה”（“，”）一視同仁地處理，故譯者可能將此習慣帶入希伯來文閱讀中，將希伯來文單詞 רפא「醫治」與 רפה「原諒」混淆。這一傳統元素也進入了《馬可福音》四章 12 節中（馬太亦常將其他阿拉米文元素帶進其福音書中），²²並隨着這一早期阿拉米猶太教傳統=>《新約》的《馬可福音》=>《新約》敘利亞文聖經諸翻譯的次序，傳遞進《新約》敘利亞文譯本。

現在的問題來了：在我們正在處理的《以賽亞書》相應段落中，敘利亞文的翻譯也偏離了希伯來文，加入了這個以「諒解」翻譯「治癒」的傳統。它是如學者埃文斯（Craig A. Evans）所介紹，隨着阿拉米文本傳統而來，²³還是來自別處？

首先，原文中“רפא”並非古奧單詞。敘利亞文《舊約》譯者們向來理解該詞，且向來不假思索地用 אסי「醫治」來直譯希伯來文同義詞 רפא（如賽 19:22，30:26，53:5，57:18，57:19）。此前學者已經發現，《以賽亞書》敘利亞文至少在一至二十九章的譯文中，對字面翻譯的要求甚高；在對熟悉詞彙進行翻譯之時，通常不會具體借鑑其他譯本的同位翻譯；即使借鑑，也壓倒性地首選七十子譯本。²⁴故，譯者在此處特意翻查阿拉米文譯本此節、並進行點對點的特定借鑑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假設是，是否猶太的阿拉米文傳統中將「醫治」翻譯為「諒解」的習慣，系統地影響了敘利亞文的譯者（就如影響了《馬太福音》的作者），而作用在這節經文的翻譯上？只能說，這種假設也很難成立。

22. M. Eugene Boring, *Mark: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Presbyteri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6), p. 16.

23. Craig A. Evans, *To See and Not Perceive, Isaiah 6.9-10 in Early Jewish and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9), p. 78.

24. 參見 Zhan Che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shitta of Isaiah”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20), pp. 163-164。

首先，如上例中所述，敘利亞文譯者們在《舊約》全書的翻譯中從未接受過這種習慣影響。更進一步說，相較於我們正在處理之第六章 10 節，《舊約》有許多其他章節的語境都允許，甚至更加鼓勵靈意化的「諒解」翻譯（如，賽 19:22；耶 3:22；何 7:1，14:5）；即使在這些章節，敘利亞文譯者也未打破嚴格的翻譯。再者，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總體而言，不同於對《馬太福音》作者，阿拉米文的猶太傳統對於《以賽亞書》敘利亞文翻譯的影響非常稀薄。²⁵綜上，這一系統影響的解釋也很難成立。

於是問題變轉化為了：既然沒有阿拉米文猶太譯文傳統的局部或者系統直接的影響，為何敘利亞文《以賽亞書》的譯者唯獨在這一節經文發生了微妙變化？究竟第六章 10 節與十九章 22 節（兩次）、三十章 26 節、五十三章 5 節、五十七章 18 節、五十七章 19 節有何不同，會招致這個不尋常的變化？假如我們允許一種並非離奇的假設：即譯者可能熟悉《新約》文本，我們可能就會發現蛛絲馬跡。第六章 10 節是上述經文中唯一一節被《新約》多次引用（太 13:14-15；可 4:12；路 8:10；約 12:40 與徒 28:26-27）並在《新約》文本中，尤其是別西大譯本中發生變異（可 4:12，S=P=LXX，C 缺失；徒 28:27，P）的案例。因為《新約》的廣泛引用，令此句經文對於熟知新約的讀者膾炙人口（「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故而較容易影響譯者；又因「就得赦免」（兩

25. E. R. Rowlands, "The Targum and the Peshitta Version of the Book of Isaiah", *Vetus Testamentum* 9.1 (1959), pp. 178-191; Weitzman,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pp. 107-109. 羅蘭茲 (E. R. Rowlands) 的文章旨在探討兩傳統在《以賽亞書》中關係，最終結論大體落在敘利亞傳統、與阿拉米傳統，雖有相似之處，卻難有直接傳承的證據，更可能同受希臘文傳統的影響。懷思曼在其總結性綜述中，最終只收錄了一個指向共同來源的例子 (7:2)，可惜這個例子也值得商榷：因詞根“**נהה**”也或兼具敘利亞及阿拉米譯文之義（參撒 7:2 及其希臘文譯）。

次) 與「就得醫治」(三次) 在敘利亞別西大《新約》皆有出現，若熟知《新約》的譯者形成記憶拮抗而互換的失誤不難想象。綜上所述，六章 10 節異文來源的三種可能性中，相較於直接來源於阿拉米文傳統的兩種可能性，倘若譯者熟知《新約》敘利亞文聖經，來自後者的模型更加合理。

2.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21 節引用《以賽亞書》二十八章 11-12 節

希伯來文《以賽亞書》二十八章 11-12 節

כי בלעגי שפה ובלשון אחרת ידבר אל־העם הזה: אשר אמר אליהם זאת המנוחה הניחו לעיף וזאת המרגעה ולא אבוא שמוע קטב [或作：譏諷] 的嘴，和外邦人的舌頭，他要對這百姓說話。他曾對他們說，這兒有安息，讓疲乏人得安息。這兒有平靜。他們卻不肯聽。)

敘利亞文《以賽亞書》二十八章 11-12 節

מטל דבמללא עטלא ובלשנא אחרנא אמלל עמה עם עמא הנא דאמרת להון הדא הי נִיחתי אניחו למטרפא והנו שליא ולא צבו למשמע (因為，借 קטב [或作：譏諷] 的語言，和外邦人的舌頭，我要對他，[即] 這百姓說話。我曾對他們說，這兒有我的安息，讓受傷人得安息。這兒有平靜。他們卻不肯聽。)

希臘文《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21 節

ἐν τῷ νόμῳ γέγραπται ὅτι ἐν ἑτερογλώσσοις καὶ ἐν χειλέσιν ἑτέρων λαλήσω τῷ λαῷ τούτῳ καὶ οὐδ' οὕτως εἰσακούσονται μου, λέγει κύριος. (律法上記着，用外邦人的語言，和外邦人的嘴唇，我要對這百姓說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我。主說。)

別西大敘利亞文《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21 節

בנמוסא כתיב דבמללא נוכריא ובלשנא אחרנא אמלל עמא עם
עמא הנא אפלא הכנא נשמעונוני אמר מריא (律法上記着說，用外
邦人的語言，和外邦人的舌頭，我要對他，〔即〕這百姓說
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我。主說。)

另附和合本《以賽亞書》二十八章 11 節

先知說，不然，主要借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頭，
對這百姓說話。

和合本《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21 節

律法上記着，主說，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
嘴唇，向這百姓說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此處的《舊約》敘利亞譯文，展現出了幾處與希伯來原文相異的特徵：（一）希伯來原文的語境，是以色列人譏諷先知無法教導人，只會「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tsaw latsaw tsaw latsaw, qaw laqaw qaw laqaw, ze'er sham ze'er sham*，模仿教導含糊急促之意）之時，先知以賽亞的反唇相譏：我的教導尚無人聽，神更要讓結巴（或作嘲笑者）與外邦入侵者來教導這百姓。²⁶繼而，先知以賽亞，作為發言人，用第三人稱引出神言：「他說」。而在敘利亞文翻譯中，這段文字切換到第一人稱：在這種情況下，有鑑於先知以賽亞不會是「借外邦人的舌頭說話」的主體，這兩節譯文的實際發言人是神本人。（二）靜態的敘利亞文介詞 עם 用以翻譯動態的希伯來文介詞 אל 十分罕見。敘利亞

26. Wim Beuken, *Isaiah 28-39,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Leuven: Peeters, 2000), pp. 37-38.

譯者在以賽亞中的介詞十分規整，在一百多處的翻譯中，除去少數可以被語境顯著解釋的情況（如動詞要求譯為ב，如第八章 22 節與十四章 16 節；或因表達對神的尊敬翻譯成קדם，如十九章 20 節，只用介詞ל(לית)或על翻譯希伯來文的אל），也再無使用敘利亞介詞עם來翻譯希伯來文的אל。（三）尤其特殊地，在此句的敘利亞文翻譯中，出現了一個「提前代詞」的短語עמה עם עמא；具體地說，敘利亞文在動賓或介賓短語的表達中，可以代詞+具體名詞的冗餘形式表達，如「在它裏面，（即）盒子（裏面）」。²⁷但與這個慣常表達相比，譯者在二十九章 11 節中不僅重複了代詞和賓語，而且重複了介詞עם本身。這一介詞+提前代詞+重複介詞+賓語的結構，即使不是錯誤，也極其罕見。經查閱，在整個敘利亞文《舊約》翻譯中，只有《創世記》二十一章 20 節與《耶利米書》四十一章 3 節有類似結構出現；而後者也是因為對應希伯來文中相同的結構才不得以而為之。

此三特異現象，即（一）發言主體從先知向神轉換、（二）介詞翻譯的錯誤或偏差，以及（三）不規則的代詞重複在前置賓語結構中的使用，究竟是內源性的問題，還是外來的影響？我們看到，七十子譯本和阿拉米文譯本的對應章節均無此性狀。但是當我們將目光移向《新約》對應引用章節，問題似乎有了線索。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中，保羅繼續探討方言的問題。於是在十四章 21 節，保羅省略性地化用《以賽亞書》章節，來探討教會中方言的效果問題，並在引用結尾添上「主說」。如此，《以賽亞書》中先知對以色列民眾的警告，也變成了神對教會的直接教導，「外邦人的語言」，此時指涉教會中頗為難解的方言。無論

27. Theodore H. Robinson & J. F. Coakley, *Robinson's Paradigms and Exercises in Syriac Grammar* (6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0-32.

保羅是自行改造，還是引用了其他希臘文本，視角的切換（「我要對這百姓說話」）被別西大新約的譯文繼承了下來：此與上述特徵（一）相合。另外，《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21 節的別西大譯者同樣使用了介詞 $\epsilon\upsilon$ ，和一樣有問題的介賓短語 $\epsilon\mu\alpha\kappa\ \epsilon\mu\ \epsilon\mu\ \epsilon\mu$ ，這與特徵（二）和（三）完美相合。綜上，尤其是基於特徵（三），兩者有文字上很可能存在直接的互相影響。

如果是這樣，我們還需要確定一下影響的方向。很顯然，關於特徵（一），《新約》希臘文本的發言者是第一人稱的神，而《舊約》希伯來文不是；關於特徵（二）《新約》希臘文本的第三格“ $\tau\tilde{\omega}\ \lambda\alpha\tilde{\omega}\ \tau\acute{o}\upsilon\tau\omega$ ”的介詞未定。在這種情況下，用 $\epsilon\upsilon$ 加諸 $\lambda\acute{\epsilon}\gamma\omega$ 的間接賓語之上是慣常且通行的翻譯（例如林前 3:1；林後 7:14；弗 4:25，5:19；貼前 2:2；來 1:1,2）。總之，此二特徵對於別西大《以賽亞書》作為《希伯來聖經》的譯文來說是蹊蹺的，但對於別西大《哥林多前書》作為《新約》聖經的翻譯都是合理正確的。故不難推斷，影響的方向，是《新約》譯文影響《舊約》譯文。

非常特殊且有趣地，我還在經文羅列末尾摘抄了和合本相應章句。因為就在此節，和合本《以賽亞書》譯者和別西大《以賽亞書》譯者犯了同樣的錯誤！在《哥林多後書》中，保羅或為突出主題（因在討論方言），或者因為引了別的版本，將《舊約》中「譏諷的嘴」（MT=LXX）摘作「外邦人的嘴」（NTG）。《新約》中文譯者將希臘原文成功譯出，而《舊約》字句與《新約》雷同，則是個典型的「引《新約》譯文入《舊約》譯文」的錯誤了。因與本文主旨無涉，故不深究羅列和合本參考之現代字典譯文；僅簡單展現，知《新舊約》引文譯者間互動的現象，古今東西或不孤也。

3. 《啟示錄》六章 13 節引用《以賽亞書》三十四章 4 節
希伯來文《以賽亞書》（MT）三十四章 4 節

וכל־צבאם יבול כנבל עלה מגפן וכנבלת מתאנה (其軍兵皆將殘敗，如葉片從葡萄藤凋零，又如凋謝者從無花果樹。)

七十子譯本《以賽亞書》（LXX）三十四章 4 節

καὶ πάντα τὰ ἄστρα πεσεῖται ὡς φύλλα ἐξ ἁμπέλου καὶ ὡς πίπτει φύλλα ἀπὸ συκῆς (天上星辰皆墜落，如葉片從葡萄藤凋零，又如葉片從無花果樹)

敘利亞文《以賽亞書》（OTP）三十四章 4 節

וכלה חילהון נתר איך טרפא דנתר מן גפתא ואיך פקועיא מן תתא (其軍兵皆將殘敗，如葉片從葡萄藤凋零，又如生無花果從無花果樹)

別西大敘利亞文《啟示錄》六章 13 節

וכוכבא דשמיא נפלו על ארעא איך תתא דשדיא פקועיה מן רוהא עשינתא מא דמתתזי (= 希臘文《啟示錄》六章 13 節：καὶ οἱ ἄστερες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ἔπεσαν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ὡς συκῆ βάλλει τοὺς ὀλύνθους αὐτῆς ὑπὸ ἀνέμου μεγάλου σειομένη; 且天上的星辰墜落與地，如無花果樹拋下生無花果，當其被大風搖動之時)

首先，這又是一個《舊約》敘利亞文偏離希伯來原文的例子（滿足條件一）。一切都源於一個希伯來文中的分詞：נבלת（凋謝的）。究竟是甚麼從無花果樹上飄落而下？希伯來原文並未點出。希臘文（φύλλα）及拉丁文（folium）均選擇直接複製排比句前項：樹葉從樹上落下。可惜，這一解決方案並不完美，因為樹葉（עלה）一詞的詞性與陰性分詞不符合。而阿拉米文翻譯選擇直接用同源名詞避開這一問

題 (אֲזַבֵּב) 。敘利亞文譯者，依其較阿拉米文譯文通常更為嚴謹的風格，本也可採取這一簡單策略。然而他並不，而是大膽採取了與《新約》希臘文 = 敘利亞文本的特殊讀法：「生無花果」 (הִיָּוִיקָפּ = ὄλυνθος 「夏季的無花果」) 從樹上飄落。考慮到《以賽亞書》三十四章 4 節與《啟示錄》六章 13 節有直接的引用關係，這一處文本耦合就已經有極大的依賴嫌疑了。

如果說，還需要擔心偶然性問題：即《舊約》的敘利亞文翻譯者，也可能獨立得出是「無花果」從無花果樹上落下的結論，如同「葉片從酒藤上落下」；那麼，我們需要再考慮一個更加日常語言的常識問題：如果說，我們，如同譯者，面臨一道選擇題：「如同葉片從酒藤上落下，（生澀的／成熟的？）無花果也從無花果樹上落下」的時候，我們是傾向選擇「生澀」的，還是「成熟」的？按照自然邏輯，我們會傾向選擇「成熟」的，因為瓜熟蒂落的自然邏輯，除非是有特殊的資訊需要傳達。「生無花果」這一詞在希臘文（ὄλυνθος：僅歌 2:13 與啟 6:13）、敘利亞文 (הִיָּוִיקָפּ：僅賽 34:4；歌 2:13 與啟 6:13) 及希伯來文《聖經》 (פָּגַה：僅歌 2:13) 中都非常罕見，通常是要強調某些特殊意涵的時候才特意使用的詞彙：例如在《雅歌》二章 13 節中，戀人在「花朵生長，葡萄樹開花」之時，呼喚他的美人出遊，此背景下描述無花果漸熟之景，當然有濃濃的情緒漸熟 (הִנָּה) 的意味。而在《啟示錄》的上下文背景之下，第六封印剛被解開，「大風搖動無花果樹」，自有山雨來時、審判不等世人的意味。這種情境下，無花果被大風撼動墜地，早夭意味也十分明顯。然而，在我們的《以賽亞書》語境中，並無「大風搖樹」的場景。相對應的，是「葡萄葉落」的情景：葡萄葉落之秋，並非是無花果青澀之夏，而是其黃熟之時。在這

個語境當中，「早夭」的一面未太突出，而是「晚衰」的成分更加明顯（上文：「萬軍殘敗，如藤葉凋零」），無理由生硬地採取青果選項。考慮到語境的不適應和這一詞本身的稀有，受到《新約》引用章節的敘利亞文影響，是最合理的解釋了。

4. 《以賽亞書》二十五章 6-8a 節引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這兩節半經文翻譯系統性地偏離希伯來原文，這在整本《以賽亞書》敘利亞文譯本中並不多見。有些偏差甚為顯著，如將「陳酒的宴席」譯作「存留的宴席」，或是將「帕子之面」（先不追究「吞滅帕子之面」是甚麼意思）譯作「統治萬民的統治者的臉」。根據筆者研究，此段翻譯受到了來自《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敘利亞文章句的影響，然而限於篇幅，在此就略去的太過具體分析，而先進行綜述性報告。在這個段落中，以賽亞預言了一場在錫安山上的宴席：在這場盛宴上，神將會安慰她的子民。根據希伯來文原文：

ועשה יהוה צבאות לכל־העמים בהר הזה משתה שמנים משתה
שמרים שמנים ממחים שמרים מזמקים: ובלע בהר הזה פני־הלוט הלוט
על־כל־העמים והמסכה הנסוכה על־כל־הגוים: בלע המות לנצח
（在這山上，萬軍之雅威必為萬民設擺甘食的筵席，陳酒的宴席，
〔有〕肥甘的好貨，並澄清的陳酒。他將在這山上吞滅帕子
之面，遮蔽萬民的帕子，與遮蔽萬民的紗巾。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

敘利亞文的翻譯卻成為：

ונעבד מריא חילתנא בכלהון עממא נטורא הנא משתיא שמינא
ומשתיא נטירא ושמינא דמחינו שמינא ועשינא ונתבלע בטורא הנא אפי
שליטא שליט הוא על כלהון עממא ונכסתא דאתנכסת על אפי כלהון
עממא (在這山上，萬軍之雅威必為萬
民設擺甘食的筵席，存留的宴席，〔宴席〕肥甘，能給我們
生命，肥甘，且給人力量。他將在這山上吞滅統治萬民的統
治者的臉，與為萬民緣故而犧牲的祭物。他將在勝利中吞滅
死亡且直到永遠，**讀法 I**)

讀法 I 是學者范德科艾 (Arie van der Kooij) 在其博士論文中給出的的解決方案。對於這一讀法，其已經有了相對完備的闡釋，並基於該讀法將該段落作為敘利亞文《以賽亞書》的基督教來源的證據之一。²⁸對於范德科艾而言，該翻譯充滿了彌賽亞氣息，並直接指向耶穌基督。可惜，如果我們依照譯文細細品味，只能說，其所傳達的資訊只是與基督教義相相兼容，而非一定是基督教的。畢竟，萬軍之耶和華為其僕人擺設筵席、並「得勝」永遠的圖景，並非一定指向十字架事件；其完全可以被理解為希伯來原文末世圖景的一種猶太教內部的發展而已。

范德科艾完全沒有注意到的是，這一切的變化，都是敘利亞文《以賽亞書》的譯文系統性脫離希伯來文原文，而向《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敘利亞文經文位移的結果，且最終相似之處，不僅是神學主題的共鳴，而且是用詞層面的雷同。這裏每節各舉一個例子：

28. Arie van der Kooij, *Die alten Textzeugen des Jesajabuches: ein Beitrag zur Textgeschichte des Alten Testaments* (Freiburg: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1), pp. 273ff.

一、敘利亞文《以賽亞書》二十五章 6 節

דמחינן (給人生命的)

ואדם אחריא לרוחא מחינתא (林前 15:45：末後的亞當，
成了給人生命的靈)

二、敘利亞文《以賽亞書》二十五章 7 節

שליטא דשליט (統領的統領者)

מא דבטל כל ריש וכל שולטן וכל חילין (林前 15:24：那時，
基督將一切為首的，統領的，有能的，都毀滅了)

三、敘利亞文《以賽亞書》二十五章 8 節

לזכו (在勝利中)

דכתיבא דאתבלע מותא בזכותא (林前 15:54：死亡在勝利
中被吞滅)

須知，這些例子中的每一個別西大《以賽亞書》譯文中與《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前回響的用語，如與希伯來原文比較，都是頗有問題的翻譯。並且，更重要地，范德科艾沒有注意到，這些本就存在爭議的用詞，幾乎全是多義詞。譯者奇妙地利用了敘利亞文輔音文本的不穩定性，使用了大量容易造成歧義的單詞，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字遊戲。如果按照幾個多義詞聯合起來的讀法，敘利亞譯文又可以被讀作（所有雙關語用雙橫線標識）：

在這山上，萬軍之雅威必為萬民設擺甘食的筵席，存留
的宴席，（宴席是）天上的，用我們的救主做成的，天上的，
且殘忍的。他將在這山上擊打統治萬民的統治者的臉，與為

萬國緣故而犧牲的祭物。他將在勝利中吞滅死亡且直到永遠
(讀法 II)。

按照這種讀法，我們又多出一處與《哥林多前書》十五章顯著對應的字眼：

四、וְשִׁמְיָנָא דְמַחֲיִינָא שְׁמִינָא וְעִשְׂנָא (敘利亞文賽 25:6：天上的，用我們的救主做成的，天上的，且殘忍的)

וְאֵית פְּגָרָא שְׁמִינָא וְאֵית פְּגָרָא אֲרַעְנִיָּא אֱלֵא אַחֲרִין הוּא שׁוֹבְחָא
לְשִׁמְיָנָא וְאַחֲרִין דְאַרְעֵנִיָּא (林前 15:14：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的形體……)

在此，「天上的」、「用救主做成的」、「殘忍的」宴席，顯然更強烈地指涉向聖餐和十字架。但至於為甚麼「擊打統治者的臉」？或許因為：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他們就用手掌打他。(約 19:1-3)

並且，如果再作深究，我可以可以援引埃德薩當地——聖經就是在這個城市被翻譯至敘利亞文的——的一個關於耶穌的傳說：

哈南作為國王的畫家，用上等的畫具畫出了耶穌的肖像，並將它帶給了阿布加王他的主人。當阿布加王看見肖像，他高興地手下，並誠惶誠恐將其置於他的皇宮之中（《亞戴的教訓》13）。

引文所記載的就是基督教「聖顏帕子」崇拜傳統的來源之一。最晚在優西比烏（Eusebius）的卒年（339/340），這個傳統就已經形成。而聖顏崇拜的傳統，或許正是促使作者將希伯來文「帕面將被吞沒」譯成敘利亞文（讀法 II）的「君王之面將被擊傷」的癥結。至此，之所以詰屈聱牙的「吞滅帕子之面」會被敘利亞文譯者用雙關語譯出「擊打統治者的臉」的意思：我們幾乎可以在敘利亞文傳統內部找到可能的解釋。然而更加具體的論證，須筆者另撰文系統闡述。在此僅僅圍繞本文主旨，表明在這段翻譯者系統偏離希伯來原文的、充滿文字遊戲的譯文中，《新約》的《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影響不缺席。作者通過系統性地引入《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中的大量單詞，雖然造成了譯文從希伯來原文的偏誤，但是這種偏誤，極其隱蔽地傳達了大量基督教資訊（尤其在讀法 II 中），恐怕不是無意，而是有心，或者說，是太有心。在這個意義上，格爾斯通（Anthony Gelston）關於該段落譯者希望忠實傳達希伯來文原意的判斷，不僅草率，且闕之細膩。²⁹我們發現，譯者只是在表面上尊重希伯來原文，或者說，譯者在戴着希伯來原文的枷鎖舞蹈。論證雖然簡短，但是在上文若干例子中，《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敘利亞譯文都是準確的，而《以賽亞書》二十五章 6-8a 節的譯文是普遍蹊蹺的。後者化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章句，而非相反。

三、最終討論：不是新瓶裝陳酒，倒是舊人看新曆

如上文所述，通過對敘利亞文《以賽亞書》新約引文的研究，博多爾得出的結論是，沒有明顯證據表明，《新約》

29. Gelston, "Was the Peshitta of Isaiah of Christian Origin?", p. 581.

福音書的翻譯者系統參考並借鑑對應的《舊約》敘利亞文本。可惜，基於「新依賴舊」的慣常思維，博多爾在其文中並未考慮本文所提出的可能性：即考察《舊約》敘利亞翻譯受到《新約》敘利亞文翻譯的影響。在這個視角下，我們不僅僅考慮《新約》「引用」《舊約》的可能性，還需要考慮《舊約》翻譯受到《新約》翻譯的逆向的影響的可能性。而如上文所展現的四個例子，表明該「新影響舊」的模型或是可以考慮的考察路徑。事實上，類似的影響，不僅限於以上所述的四個例子，還有《以賽亞書》數處其他章節（13:6，28:16，33:21，34:4，40:3），因為篇幅所限，不能完全展現。這些依賴有時或許無意，有時卻明顯有心。雖然總體上，譯者維持着其譯文作為直譯的品質，即使有偏差，也是小的字句層面的偏差；但就是這樣的小的、無關宗旨的漂移，更能展現「舊依賴新」的技術框架可能性：畢竟，很難想象後世的篡改者會感興趣在這些章節裏、刻意塞進那些尤其是教義含量本不高的改動。

回到本文標題提出的問題：是基督徒的，還是猶太人的？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我想，單就《以賽亞書》敘利亞文譯本一卷書而言，本研究的答案指向是明晰的：譯者對《新約》敘利亞文譯本的某個形態頗熟悉，以致難以完全維持自己慣常所有的、忠於希伯來文原文的翻譯習慣，屢屢發生朝向《新約》敘利亞經文的漂移。這基本可以為譯者的基督徒身份再增添一個全新的證據。

然而，這個結論一定反對譯者是個猶太教徒嗎？不儘然。我們知道，譯者要面對的原文是希伯來文。如果是外邦基督徒，可否有希望自學成才，掌握這門困難的語言？在古代世界，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悲觀。例如，古代世界最重要的聖經版本學家奧利金（Origen），雖然編纂了包含希伯來

文的六經對文 (Hexapla) ，但需要猶太人的說明才能完成工作。³⁰再例如，時常推崇希伯來文本的神聖性 (Hebraica Veritas) 的拉丁文翻譯者杰羅姆，其真實希伯來文水準也值得懷疑。³¹所以，更可能的情況是，譯者，或者至少部分譯者，是猶太出身。這進一步印證了懷思曼 (Michael Weitzman) 在其遺作《敘利亞文舊約導論》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中得出的經典綜合結論：別西大《舊約》譯本，正是一群在艾德薩的漸漸皈依向基督教的猶太教徒所完成。³²

這樣的雙重教派身份，對應着譯本中的一些溫和的事實：即《舊約》的翻譯者，並未試圖激進強硬地植入《新約》中的基督教訊息。相反地，《新約》對他們的影響，更多是潛移默化，並且發生在一些與教派身份相當無關的內容之上：例如，對於猶太教徒／基督徒來說，末世究竟是如「成熟的無花果」還是「生無花果」落下，大多數時候無關要旨。更多時候，這種影響，可能僅僅是基督徒對於《新約》的熟悉導致的潛意識引用。即便是在譯者應當是有意識植入大量新約資訊的章節如《以賽亞書》二十五章 6-8a 節，作者也沒有太過誇張地篡改文本或者乾脆意譯，而是小心翼翼地將諸如「天上的」「用救主做成的」宴席之類的資訊，用雙關語，掩藏在一個還算得體的譯文之下。

本文的另外一個結論，是關於別西大《舊約聖經》譯本，至少是《以賽亞書》的翻譯時間的推論。長久以來，學界公認的別西大《舊約》的翻譯時間，大約是在西元二世紀

30. Nicholas de Lange, *Origen and the Jews: Studies in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in Third-Century Pale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2-23.

31. Bruce M. Metzger, *The Bible in Translation: 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1), p. 33.

32. Weitzman,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pp. 206-262.

中葉成書；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塔提安的《四福音調和》展現出對別西大《舊約》翻譯的依賴；而前者的產生時間在二世紀中。我無意走向另一個極端，聲稱整本《以賽亞書》都要晚於別西大《新約》才被譯出。我只是試圖模糊這樣的一個清晰通透路線圖，即：別西大版本的《舊約》部分（大約西元 150 年）—《四福音調和》（大約西元 160 年至 175 年）—別西大版本的《新約》部分（大約西元 300 年）。本文所展現的別西大版本的《舊約》翻譯系統依賴《新約》別西大版本的現象表明，敘利亞文別西大版本的《以賽亞書》，有相當部分要晚於別西大版《新約》文本的定稿。很可能《新約》、《舊約》的敘利亞文版本的翻譯歷史，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或者至少，《舊約》翻譯的部分工作要一直延續到保羅書信的問世之後（大約西元 300 年）。畢竟任何一個大體量的古代翻譯過程，都可能綿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傳統政治歷史的敘述框架下，我們所熟知的新舊教派衝突歷史，乃至基督教內部鬥爭歷史，都顯得旗幟鮮明、充滿鬥爭的理由和邏輯。如果我們的斷代可靠（四世紀之後初最終成書），我們知道，就在別西大敘利亞文《新舊約》完整成書後的第三次（431 年）與第四次（451 年）大公會議之上，敘利亞基督教將被拉丁和希臘教會因為耶穌神人二性的議題杯葛，最終只能將活動和發展的重心移向波斯以東乃至中華疆土。然而，我們回到最初的譯者日常，所見的卻不都是鬥爭，而是這個在拉丁教會和希臘教會、在猶太教徒和正統基督教徒的夾縫中生存的一群沒有太多歷史外證的敘利亞猶太基督教徒，在默默創造着自己的翻譯。在這個創造中，他們不多置喙神學議題的爭論，而只是專注細節地一句句翻譯着聖典；如此，他們卻無意橋接了暴

風眼中的幾個離散的文化群體，並將自己的翻譯帶到了絲路另一端。

最後，本文的方法論也表明，基督教徒在從事《舊約》翻譯的過程之中，受到《新約》神學以及《新約》字句的影響，實屬百密一疏。然而作為忠實的譯者，是應當將《新舊約》中的相關文本進行和諧化處理，還是應當儘力保存其平行文本間的微小出入：本文雖不能給這一聖經翻譯的原則性問題一個全面的答案，但至少能為未來中文聖經的譯者／修訂者闡明這一無法解決的兩難。畢竟，面對這種兩難，一千多年前的聖經譯者／修訂者就已經一次次地犯難過了。

作者電郵地址：zhanchen@uic.edu.cn

外文書目

- Beuken, Wim. *Isaiah 28-39.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Leuven: Peeters, 2000.
- Bloch, Joshua. "The Authorship of the Peshitta".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35.4 (1919). pp. 215-222.
- Bodor, Attila. "The Use of the Peshitta of Isaiah in Rendering Isaiah Quotations in the Old Syriac and Peshitta Gospels". *Aramaic Studies* 16.1 (2018). pp. 20-41.
- Bogaert, Pierre-Maurice. "The Latin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oachim Schaper & James Carleton Pag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14-517.
- Borbone, Pier Giorgio. "Peshitta Psalm 34:6 from Syria to China". In *Text, Translation, and Tradition: Studies on the Peshitta and Its Use in the Syriac Tradition*. Edited by W. Th van Peursen & Bas ter Haar Romeny. Leiden: Brill, 2006. pp. 1-10.
- Boring, M. Eugene. *Mark: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Presbyteri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6.
- Brock, Sebastian P. "Text History and Text Division in Peshitta Isaiah". In *The Peshitta - Its Early Text and History*. Edited by P. B. Dirksen & M. J. Mulder. Leiden: Brill, 1988. pp. 49-80.
- Chen, Zh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shitta of Isaiah".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20.
- Cornill, Carl Heinrich. *Das Buch des Propheten Ezechiel*. Leipzig: JCHinrichs, 1886.
- de Lange, Nicholas. *Origen and the Jews: Studies in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 in Third-Century Pale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ickens, Mark. "The Importance of the Psalter at Turfa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Edited by Li Tang &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Zürich; Berlin; Münster: LIT Verlag, 2013. pp. 357-380.
- ____. "The Syriac Bible in Central Asia". In *The Christian Heritage of Iraq*. Edited by John Watt, Sidney H. Griffith, Florence Jullien, Sebastian P. Brock, Suha Rassam, Wassilios Klein, Alexei Savchenko, Mark Dickens, Heleen van den Berg et al.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09. pp. 92-120.
- Evans, Craig A. *To See and Not Perceive, Isaiah 6.9-10 in Early Jewish and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9.
- Fränkel, Sigmund. *Die syrische Uebersetzung zu den Büchern der Chronik*. Leipzig, 1879.
- Geiger, Abraham. "Jüdische Begriffe und Worte innerhalb der syrischen Literatu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21.3 (1867). pp. 487-492.
- Gelston, Anthony. "Was the Peshitta of Isaiah of Christian Origin?" In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Scroll of Isaiah*. Edited by Craig C. Broyles & Craig A. Evans. Leiden: Brill, 1997. pp. 563-582.
- Joosten, Jan. "The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in the Old Syriac and Peshitta Gospels". *Textus* 15 (1990). pp. 55-76.
- ____. "Tatian's Diatessaron and the Old Testament Peshitta".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0.3 (2001). pp. 501-523.
- ____. "Le Diatessaron syriaque". In *Le Nouveau Testament en syriaque*. Edited by Jean-Claude Haelewyck. Paris: Geuthner, 2017. pp. 55-66.
- Kim, Jintae. "Targum Isaiah 53 and the New Testament Concept of Atonement". *Journal of Greco-Roma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5 (2008). pp. 81-98.
- Kiraz, George Anton. *Comparative Edition of the Syriac Gospels: Aligning the Sinaiticus, Curetonianus, Peshitta and Harklean Versions*. Leiden: Brill, 1996.
- Metzger, Bruce M. *The Early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ir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Limi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77.

- _____. *The Bible in Translation: 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1.
- Perles, Perets. *Meletemata Peschiththoniana*. Breslau: Friedrich, 1859.
- Robinson, Theodore H., & J. F. Coakley. *Robinson's Paradigms and Exercises in Syriac Grammar*. Six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Rowlands, E. R. "The Targum and the Peshitta Version of the Book of Isaiah". *Vetus Testamentum* 9.1 (1959). pp. 178-191.
- van der Kooij, Arie. *Die alten Textzeugen des Jesajabuches: ein Beitrag zur Textgeschichte des Alten Testaments*. Freiburg: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1.
- Warszawski, Ludwig. "Die Peschitta zu Isaia (Cap. 1-39), Ihr Verhältnis zum massoretischen Texte, zur Septuaginta und zum Targum". Ph.D. dissertation, Grossherzogl. Landes-Universität zu Giessen, 1897.
- Weitzman, Michael.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illiams, Peter J.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ume 1,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oachim Schaper & James Carleton Pag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27-535.
- Würthwein, Ernst.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ia Hebraica*. 2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Xiaoyang, Zhao.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arshman, Morrison, and Basset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6.2 (2012). pp. 6-34.

Jewish, or Christia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Peshitta of Isaiah

CHEN Zhan

Assistant Professor

Research Centre for History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The Syriac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Peshitta),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versions of the Bible, was far reaching, even reaching as far as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While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huge debates as to the origin of the Peshitta, common opinion dates the Peshitta of Isaiah, as a whole, to the 2nd century AD, and ascribes it to Syriac Jewish Christia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its origins better. Using four exampl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Peshitta of Isaiah depends on the wording of the Syriac New Testament. This conclusion bears further implications: One of which is that it challenges the established early dating of the Peshitta, although it does further confirm the Jewish-Christian identity of

the translators. Overall, this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the world of the Syriac-speaking translators, which is relatively under-documented.

Keywords: Peshitta; Syriac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Judaism; Isaiah; Septuagint